

寻找成吉思汗

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

(英)谢韦仑 刘丽真译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 / (英) 谢韦仑著；刘丽真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8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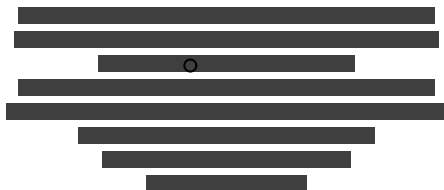
书名原文：In Search of Genghis Khan

ISBN 7-5366-7301-9

I. 寻... II. ① 谢... ② 刘... III. 蒙古族—民族文化—考察—中国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4518号



版贸核渝字(2005)第59号

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

In Search of Genghis Khan

[英] 提姆·谢韦仑 著

刘丽真 译

责任编辑 周英斌

封面设计 鱼羽图文设计

技术设计 鱼羽图文设计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发行电话:023-68814956)

金坛市教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40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1千

版次 2005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66-7301-9/K · 401

定价：26.00元

行万里天涯路 念天地之悠悠

——《旅游和探险经典文库》序

葛剑雄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原始时代的人类生产能力极其有限，生存能力低下，只能经常性地、无目的地迁徙。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大量自觉与不自觉的探险经历。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或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没有留下早期的探险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的踪迹东至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北至今内蒙古，南至湘江流域。如果将此记载看成一个以黄帝或其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活动的話，其中应该有不少探险事迹，只是当事人未必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虽有而未留下记载。

不过从《山海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古人并非没有探险，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分歧很

大，但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其中包含的原始资料则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基本不超过今国界，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阔，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闻趣事，其中总该有得于记录者直接的经历。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海经》是中国早期探险记录的汇编。如果认为《山海经》的内容过于荒渺，那么在内地，甚至沿海发现的和田玉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将产于昆仑山的玉石运到数千公里之外，其中肯定有不少探险故事。

《穆天子传》尽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经历或当时的记载，但至少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的向往。而其中记录的内容，也或多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和丰富想像。昆仑山、西王母被神化，固然与人们的愿望有关，但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说明当时的人还习惯于向外界寻求精神和物质财富。生活在战国后期的屈原，尽管游踪有限，但从他的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他的探险精神。

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一统大业的秦始皇，虽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皇帝体制，却是皇帝中为数不多的旅游和探险爱好者，对自己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也有浓厚的兴趣。在灭六国后，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全国性的巡游，最终死在途中。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批方士扬帆远航，虽然他们始终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不死药和神仙，却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数千人的大规模移民。

汉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一度激活华夏诸族的外向意识，被誉为中国第一探险家的张骞，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尝试联络已迁至中亚的月氏夹击匈奴，才意外取得“凿空”——通西域的伟大成果，将中原人的足迹远推到大宛、乌孙、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等地（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所了解的地理知识范围更大。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后尘，在国内广泛巡游，并且特别钟情于边境和海滨，显示了他对外界的强烈向往。

但秦始皇、汉武帝式的帝王从此成为千古绝响，随着中央帝

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展，由皇帝到臣民，对境外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因素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汉朝至清朝中期，中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疆域最辽阔的国家。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朝鲜、越南等政权都是中国的藩属，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时还无法望中国的项背。太平洋、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欧亚大草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直到16世纪西方的远洋船接近中国之前，还没有外来势力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北方的牧业民族虽然曾不止一次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但最终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在12世纪突破1亿，17世纪突破2亿，19世纪突破4亿，但完全可由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养。除少数奢侈品外，中国的物产中心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外贸易没有依赖。所以当英国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时，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除了体制上从无先例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儒家的“夷夏之辨”和“五服”学说，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天下再也没有比中国更文明富裕的地方，除了华夏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和要荒之地。

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国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寻求财富和文明的动力，更不会想到要到境外去旅游或探险。就是在汉唐盛世，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也只是敞开大门让境外的人进来，而不是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己的臣民走出去。在外贸发达的唐宋时代，外贸商人也主要来自外国。当西方商人已经敲响中国的大门时，明朝的反应是“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以至福建沿海的商人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手段而成为“海盗”，甚至雇佣日本武士形成“倭寇”。尽管600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达西亚、东非，却连完整的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更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极

不相称的一个现象，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现存的有关境外的记录都是非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副产品。例如，张骞、《中天竺国行记》作者王玄策、《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西域行程记》作者陈诚、《异域录》作者图理琛是外交官，《佛国记》（《法显传》）作者法显、宋云、《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经的虔诚佛教徒，《经行记》的作者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是奉召谒见成吉思汗的道士丘处机的随员。他们的记载往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或惟一的，如《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今阿富汗境内巴米扬大佛的描述，不仅证实了大佛建造于公元7世纪，而且还给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卧佛的重要信息。要是没有《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的记载，这座古城也许会继续掩埋在热带丛林中。这些记载的产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如玄奘返国后就要翻译佛经，要不是唐太宗专门下令，就不会撰写《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或许是例外，他是因“好游”才多次出国的，不过他有幸搭乘外国商船，否则就只能梦游或卧游了。

真正的异数是徐霞客，他是惟一称得上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人物，并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地理学成就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但他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特殊因素：科场失意使他不得不绝意功名，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拥有充足的旅费，能干的母亲使他无家累之忧，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使他能旅途享受不少公费或私人接待，友人中的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后流传，现代地学家丁文江的发现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学成就得到肯定和发扬。只要缺少一点，或许就没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不过徐霞客的足迹没有超出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连西藏也没有到，更不可能出国探险，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具备实施探险的能力。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黄河的源头，在那里建一座供吐蕃商人与内地贸易的城市，并设立转动站，下令都实与阔阔出两人率

队考察。他们于当年四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此后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记》，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记录已相当具体准确。乾隆四十七年（1781），阿弥达受命探寻河源，以便就地祭祀河神。这次的探险将黄河正源定在星宿海西南的阿勒坦郭勒，即卡日曲，与1978年青海省政府组织的考察结果完全一致。这证明中国长期缺乏探险传统、中国人不能去境外探险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现实的需要。

反观世界上一些航海、探险发达的国家，探险的范围广、产生探险家多的民族，无不有其深远的传统和迫切的需要。例如，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不以对外贸易为致富手段，以对外殖民和扩张为立国之本，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本土一般幅员不广、资源匮乏、耕地有限，甚至连水源都不足。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并不困难，海外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后，阿拉伯、西欧、北欧一些国家致力于航海和外贸，大批航海家、探险家不顾艰险寻找环球航路，发现新大陆，也无一不是出于国内的生存压力和扩张需求，无不以夺取土地、奴隶、黄金、木材、矿产、市场、要塞、殖民地为目的。连早期的南极考察也是如此，甚至是为了猎杀企鹅获取制皂的油脂，出售海豹的皮肉牟利。但是正是这样卑鄙邪恶的目的，促成了新大陆和南极的真正“发现”，造就了不少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在一些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探险的传统。在这样的条件下，职业探险家，包括一些纯粹出于人文和科学目的的真正探险家应运而生，有的不惜为之献身，成为人类的骄傲，他们的记录和著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或长处，也不可能始终先进，所以都必须向其他国家或民族学习。应该承认，直到今天，中国的探险事业还比较落后，中国人在世界范围的探险还很有限。2000年我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去长城站期间，就受到很大的震动。当然，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走向世界，在地球的两极、全球所有的高峰、五大洲、七大洋都已留下了当代中国人的足迹，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指日可待。但历史无法重复，了解人类以往的探险经历和经验不可或缺。而且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以往探险家记录的现象有的已永久消失，只能从他们的书中领略了。

重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旅游与探险经典文丛”，其着眼点显然正在于此。该文丛融探险、考古、文学、文化人类学于一体，既勾勒探险家们多姿多彩的极限生涯，也凸现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更重绘人类文明不为人所知的曲折发展图景。该文丛预计推出三辑，首辑推出的十本新书中，有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探险经典海尔德尔的《孤筏重洋》、《太阳号草船远征记》、《复活节岛的秘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冷战时期的涉险名作《俄罗斯纪行》，有勘探成吉思汗古老帝国秘密的冒险旅行《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有复原名著《白鲸记》惊险氛围的《寻找白鲸记》，有追溯著名探险家维迪亚生平足迹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等等。稍后即将推出的二、三辑，预计会在继续关注名家名著的基础上，更注重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探险方式的独特性，在提炼个人探险经验的前提下，将世界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多样，更真切全面的描绘出来。

至于这些探险记涉及范围之广泛，记载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惊险，描述之细致传神，只有读过的人才会有体会。无论是为了科学研究，积累知识，还是为了陶冶性情，欣赏休闲，都会开卷有益。与一般读者相比，我的游踪或许较广，但我自知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地方，大多是这辈子都到不了的。2001年从南极返回途经智利时曾想去复活节岛，因多种原因未去成，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好在第一辑中就有《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多少能够弥补我的遗憾。

2005年6月5日



多亏了以下朋友的帮忙，这趟蒙古之行才能顺利开展。首先，我要感谢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欧尔沙福易（H. Olzvoi，现任蒙古驻北京大使）的协助。他当时兼任丝路计划委员会主席，我们有任何需求，只要找上他，他一定全力支持，使我们这趟旅行得以顺畅成行。蒙古驻英国大使欧祺尔巴尔（Ishetsogian Ochirbal）与馆内人员寄给我们正确的路线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巴黎总部的戴安尼（Doudou Diene）、哈特罗（Eiji Hattori）以及丝路整合办公室（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的支持，称得上热情积极，让我们感激不已。

非洲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的阿肯纳（Sirin Akiner）提供我们中亚地区的联络人名单。密德兰银行国际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Midland Bank）顾问伍尔佛（Nicolas Wolfers），替我跟苏赫迪尼（Dugersurengiin Sukherdene）接上头，再联系上蒙古国家银行（Mongolian State Bank），让我顺利在乌兰巴托进行初期安排。他的妹妹额儿仑（HO 誥 lun）充当我的翻译，也提供不少便利。水牛城（Buffalo）的汉密尔顿（Hamish Hamilton）提供我御寒的服装与睡袋，适合在蒙古5月时使用，我脚下的靴子与外套，则是由Timberland公司热心赞助。

蒙古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笑容满面的文化参事波尔浑都易(Buandelgereen Borhondoi)，不过少了芭琪曼诺娃(Tanya Rachmanova)的翻译，我终究还是会一事无成。


其他在蒙古提供我们各种协助的人还包括毕拉(Bira)院士、友谊协会(Friendship Societies)的奇密多尔扎(Chimidorj)先生、刚巴(Ganbat)先生以及外交部的刚苏赫(Gansukh)先生、刚巴巴托(Bumbyn Ganbaatar)、杨丹多尔扎(Damdinsuren Yundendorj)、音效师泽伦德扎夫(Tserendjav)，以及协助我们拍摄纪录片的蒙古电视电影厂的伊斯坎德(Ishkand)。还有带我们漫游的十多位牧民向导，他们是我们的原野导师，我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让我们分享他们的“黄金遗产”(golden heritage)。

我还要特别提到“大夫”博希吉特(Boshigit)一家人的友善好客，让我和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在乌兰巴托如沐春风。洋基通运(DHL)的艾伦(David Allen)也是我们格外感激的人士，他的想像力与慷慨的捐赠是我们这趟行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DHL遍布全球的服务点，更是空前的成就，足以媲美蒙古中古时代的驿站。

两位蒙古帝国史权威——杰克森(Peter Jackson)博士与摩根(David Morgan)博士花费心思与时间审阅我的初稿，提醒我书中几个明显与史实有出入之处。当然，书中的所有错误还是应该由作者负责。

提姆·谢韦仑

爱尔兰柯克郡(County Cork)



目录

行万里天涯路 念天地之悠悠

——《旅游与探险经典文库》序（葛剑雄）

致谢词

第一章	马年·····	001
第二章	核心·····	019
第三章	秘史·····	035
第四章	牧民·····	055
第五章	不儿罕山·····	071
第六章	三项竞技·····	089
第七章	启程·····	105
第八章	备马百匹·····	125
第九章	横越杭爱·····	141
第十章	养牛区·····	161
第十一章	曼陀罗寺·····	181
第十二章	真人西游·····	201
第十三章	猎鹰·····	213
第十四章	厉疫·····	229
第十五章	萨满·····	247
第十六章	永恒象征·····	267





LEIXING YU TANJIAS JINGHUA WENKU



—XUNZIBAO CHENGJISHIYUAN—

第一章 马年



黄道吉日出发

自白马年马月的黑马日银马时这一刻，我和保罗及六个蒙古人一起出发了。照西方人的说法，我们的出发时间是1990年7月16日，蒙古中央时间下午2点到3点之间。出发的时间不是该科学、精确点吗？照道理说，我们在定好计划和出发之间，不应该保留宽裕的时间，选择与训练马匹，让我们跟这批牲口相互适应一下吗？我们有一些陌生的设备、新帐篷、特殊的古式马鞍，不应该实地测试一下吗？我们不应该早早上路，才能在严冬来临前结束旅程吗？

但是，我的蒙古朋友却不这么想。“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六个月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Ulaan Baatar），我这么问我的朋友阿乌博德。他是一个记者，阿乌博德这个名字在蒙古文里是“真钢”的意思。“真钢”打开他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日记里并列有罗马日历和中国的阴历纪年。他飞快地翻着书页，伸出一根指头，好像很随意地点到一个日期。“就这天吧。”他宣布，“这是好日子——7月16日。”



我实在不敢质疑他的择日方法，更希望他不要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任何一丝的疑虑。理论上，我们的行程是由阿乌博德负责安排的。日期定了，总算能让我安心点。“这就搞定了。”透过翻译，我小心翼翼地说，避免造成任何误解。“既然出发的时间订在7月16日，那么，我会在出发前回到蒙古来，确认最后的准备工作是否就绪。”翻译把我的话译完之后，我发现我好像说错了什么，因为阿乌博德的屁股在椅上不安地挪了挪。“这个嘛……”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么说好了，我们可能会在7月16号出发。”他注意到我逐渐阴沉的表情。“你知道吗？我们蒙古人相信，骑马出远门，说准日期不大吉利。真的，订得一清二楚，会倒霉的。”我这才明白，这次远征跟我以前的旅行经历，一定迥然不同。

我曾经骑摩托车追寻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足迹；乘着复制的中古皮舟横越北大西洋，以便弄清楚爱尔兰修士圣布伦丹（St. Brendan）^❶之流，是怎么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千年前横越北大西洋的。我也曾经仿造了一艘8世纪的阿拉伯商船，从马斯喀特（Muscat）^❷航行到中国，目的是确认传说中的“辛巴达奇航记”到底有几分真实性。此外，还带头建造一艘青铜器时代的二十桨平底帆船（galley），沿着爱琴海驶到黑海，追寻杰森和阿尔戈船英雄（Jason and the Argonauts）^❸与尤利西斯（Ulysses）^❹的漂泊航线。我最近一次的骑马旅行经历与计

-
- ❶ 爱尔兰隐修院的创建人，曾经漫游各地，所著史诗《布伦丹航海记》，在西欧大受欢迎。
 - ❷ 阿曼首都，是一个海港城市。
 - ❸ 这是指杰森王子率领阿尔戈船英雄，历经千辛万苦，出海航行，终于取得金羊毛的传奇故事。
 - ❹ 尤利西斯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角，在木马屠城后，漂泊海上，长达九年。

划中的蒙古探险有些关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两年前，我根据第一次十字军的前进路线，踩着中古时代军人、平民、妇孺的足迹，从比利时的城堡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Holy Sepulcher)，旅程全都在马背上度过，路程长达两千五百英里。然而我事前一手策划这整趟十字军旅程，缜密设想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精准地控制手上的一分一毫。我算好每天前进的距离，搜集相关的气象信息；哪里可以休息、哪里可以补给，我一清二楚；还尽可能地试跑一下前段的道路、勘查起伏崎岖的地形。我不曾翻过中国的农历，不知道哪一天是黄道吉日。出发时间得靠这个？我想也没有想过。

但是，我没跟阿乌博德抱怨半句。如果蒙古人出远门真有这规矩，就照着规矩做吧。我只是怀疑阿乌博德与他的蒙古朋友：他们真的知道长途旅行的复杂性吗？过去两个月，他们屡屡接受蒙古报纸和电视媒体的访问，意气风发地宣布，要以他们的壮举，为祖先的成就生色。蒙古人的祖先曾经建立当时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陆地交通系统，在铁路发明之前，无可比拟。单单这点成就，就足以大肆纪念了。中古世纪，蒙古骑兵骑着结实强韧的蒙古马，传递十万火急的文书、护送络绎不绝的外国使臣，奔驰在跨越已知世界三分之二的路径上。全身皮革护具的蒙古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越过漫长的距离，蹄迹所至之处，从多瑙河畔，一直延伸到黄海海滨。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批马上高手竟然征服了沿途所有土地，缔造了横跨欧亚、空前广阔的陆上帝国。阿乌博德和他们的朋友在蒙古公开宣称，他们要效法祖先，从蒙古直奔法国，这是让人拭目以待的壮伟计划，困难的程度与从香港骑马到伦敦差不多，而他们竟然请我协助。

这是无法拒绝的邀请，我渴望已久的梦想，终于实现。二十五年前，我在牛津大学撰写毕业论文，题目就是研究十三四世纪蒙古帝国统治期间，欧洲人第一次深入中亚心脏的历程。他们是坚忍卓绝的勇